

· 中西文化 ·

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中國與歐洲早期的互動研究

張西平

[提 要] 理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必須從長時段歷史來加以考察。中國與歐洲早期的互動是理解中歐關係的重要維度,但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是從晚清中歐關係來定位自己和西方的。應從中歐早期互動的歷史、中歐經濟關係和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影響,說明當時歐洲接受中國文化的內在原因,以此,從全球史的角度,揭示中華文化的世界意義。

[關鍵詞] 中國 白銀 中華文化 啟蒙運動

[中圖分類號] K1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4 - 0081 - 10

一、在東方發現文明

今天的世界成為一個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真正開始作為全球的一個成員,參與世界的活動,世界在經濟和文化上構成一個整體。這一切都源於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①“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②對明清史的研究必須放在地理大發現這一背景下。

由葡萄牙、西班牙開啟的地理大發現,既是西方人用刀和火耕種這個世界的過程,同時也是西方殖民史的開端,拉丁美洲的血管由此被切開,葡萄牙對西非海岸的販賣黑奴亦由此開始。^③當葡萄牙從印度洋來到中國南海,西班牙從太平洋來到中國近鄰菲律賓,中國與歐洲在晚明相遇。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中國南海合圍時,他們面對著一個有著悠久文明且十分強大的中國,同時中國在與他們的接觸中開始利用西方人所開啟的全球化網絡,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明與文化。如果從全球史來看,從晚明至清中期(1500~1800)的中西接觸中,中國是以獨立、強大的國家形象展現在世界舞台的,中國與葡萄牙在新會西草灣之戰,葡萄牙船隊大敗,這是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海外擴張過程中第一次遭到的軍事挫折,也是近世中國與歐洲人的第一次小規模戰爭。^④後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雙歧島與華人海盜及倭寇勾結,勢力越來越大,無法无天,以致“福興諸府沿海患”。浙閩提督朱劼派兵圍剿,趕走葡萄牙人,填塞雙歧港。這是明軍第二次與葡萄牙人交鋒。嘉

慶二十八年走馬溪一戰，第三次與葡軍交鋒，大勝葡軍，抓葡人 16 名，黑奴 46 名，華人海盜 112 人，至此“全閩海防，千里肅清”。1554 年，葡萄牙船長索薩 (Leonel de Sousa) 與廣東海道副使汪柏達成口頭協議，允許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及附近島嶼貿易。1557 年，葡萄牙人因協助明軍消滅海盜，廣東鎮撫默許葡人居住澳門；1582 年，居澳葡人得到兩廣總督的許可，實行“自治”，澳門成為中國政府管轄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

中西關係在明清之際與晚清時期完全不同，目前許多人一談起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都是在講晚清，實際上晚明至清中前期近三百年是值得重視的。這一時期中國在與世界的交往中，絕不是處在“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相反晚明至清中前期“中國看起來跟世界上其他任何發達地區一樣‘發達’，無論是以農業生產力的水平，製造業與市場的複雜程度，還是以消費水平來衡量都是如此。中國家庭也在控制其規模，並能根據變化的經濟機會做出相應調整，當這些機會減少時便限制家庭規模，以維持消費水平高於基本生活所需；功能的專業化促成了市場和高度商業化經濟的出現；覆蓋甚廣的、以水路為基礎的運輸系統，確保了商品和人員在帝國內部的有效流動”。^⑤把明清的中國一概說成是“木乃伊式的國家”完全是對全球化早期的知識不足與偏見。

二、作為世界貨幣的白銀

中國正是在晚明至清中前期全面走進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舞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晚明的幣制改革。白銀作為明朝的官方貨幣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和至上而下的過程。白銀在明初並不是官方貨幣，它只在民間經濟活動中使用，學術界對明初至成化年間徽州地區土地買賣交易 427 件契約使用通貨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證明這一點。到嘉靖年間，貨幣的白銀化已成大勢。白銀的貨幣化是以整個社會商品經濟以及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隆慶元年 (1567)，明穆宗頒命：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只許用錢。由此白銀成為明朝的官方貨幣。而明代賦役的改革，“一鞭法”的實施，進一步推動賦役和徭役的貨幣化，以銀折役、以銀代賦，白銀滲透了晚明生活的方方面面。萬明對《萬曆會計錄》的系統整理，從計量史學和數據資料上完全證實了這一點，她認為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概念包括五重涵義：“其一，白銀從貴重商品最終走向完全貨幣形態的過程；其二，白銀從非法貨幣到合法貨幣，再到整個社會流通領域主幣的擴展過程；其三，白銀形成國家財政統一計量單位和徵收形態的過程；其四，白銀形成主幣，中國建立起實際上的白銀本位制的過程；其五，白銀成為世界貨幣”。^⑥

白銀怎樣成為了世界貨幣呢？因為當白銀成為中國的主幣後，對白銀的需求大增，但國內的銀礦開採無法滿足社會經濟對白銀的需求，只好將目光投向海外。明嘉靖年間，倭患熾烈，海禁使中日貿易受挫，而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成為中日之間轉口貿易的重要推動者，如利瑪竇所說“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從日本到馬六甲之間的諸國，如摩洛哥、暹羅、交趾支那等國家而言，澳門都可謂是印度洋上最理想的市場之一……”。^⑦這些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將中國的生絲等貨物運往日本，日本則以白銀購買，澳門的耶穌會士再用白銀購買內地的生絲等貨物，從而日本的白銀通過澳門流入中國內陸。《1618 年耶穌會士從澳門出發往日本的貨物清單》記載：“此次航行的船隊，所有六艘帆船均在耶穌會之名下，配有已簽署的耶穌會徽標，裝載 86 筐，以及 13 大箱，超過 52 擔 28 斤優質生絲，其中 25 擔 11 斤半是在此次日本交易會上購買的，每擔價格是白銀 1167 錢，包含運費和關稅”。^⑧這樣的貿易所以通暢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盛產白銀。活躍於日本與中國的耶穌會士羅德里格斯 (João Rodrigues Tçuzu 陸若漢) 在其《日本教會史》中說：“日本國有許多的礦山，出產所有種類

的金屬。例如大量的鐵、銅，此外還產出數量巨大的與銀、鉛、錫和水銀的混合物。主要的礦藏是遍佈全國的銀山”。⁹由於與中國的貿易，日本的白銀礦產在 16 世紀中期到 17 世紀前半期快速發展起來，弗蘭克統計，從 1560 到 1600 年，日本每年生產和供應 50 噸白銀，從 1600 年至 1640 年間，每年生產和供應 150 噸到 190 噸，最高峰時的 1603 年為 200 噸。在 1560 至 1640 年的 80 年間，日本成為主要的白銀生產國和出口國。¹⁰如果將從美洲運往中國的白銀和日本銷往中國的白銀相比，由日本輸入中國的白銀數量是美洲銷往中國的白銀的 3~10 倍，總的供應量達到 8,000~9,000 噸。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來到中國南海時，並未帶來更多可以與中國交換的商品，尚未工業化的葡萄牙、西班牙對亞洲的滲透，目的是為歐洲各國買到所需要的以絲綢、茶葉、瓷器為核心的亞洲產品，他們通過進入亞洲的貿易來完成這一過程。他們並不是以西方的產品來和亞洲的產品交換，他們只能要麼用白銀購買，要麼用在亞洲貿易網絡所得到的錢，來買亞洲的產品。¹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展開的貿易，只是一種轉運貿易，他們憑藉著中國商品和市場進行中介貿易，一是輸入海外物品，其中以白銀為主，二是輸出中國的貨物，以絲綢、瓷器為主。前者因為有中國市場的巨大需求，後者則完全依靠中國市場的發展。但這種轉口貿易，推動了中日之間的白銀流動。所以，學者認為“日本成為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白銀貿易的重要一翼”。¹²

白銀成為世界貨幣的另一翼是由來到中國南海的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所推動的。1565 年，黎牙實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奉西班牙王室之命，率部下從墨西哥出發抵達菲律賓宿霧島，他於 1569 年被任命為菲島總督，1571 年攻佔馬尼拉，由此奠定了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群島的基礎。¹³海盜林風逃至菲律賓，潮州把總王望高在菲律賓圍剿時得到菲律賓總督的善待，1575 年 7 月，他和西班牙神父馬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等四人回到福建，共同商議圍剿林風一事。這是中國和西班牙的第一次正式交往。¹⁴

1567 年，隨著明朝政府開放海禁，福建人開始和在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進行商業往來，中國商人運來生絲、棉布和陶瓷等商品，經雙方議價以白銀為幣成交。“1573 年，兩艘體勢巍峨的大帆船，從菲律賓的馬尼拉港駛向美洲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爾科，歷史上著名的‘馬尼拉大帆船’航行開始了。”¹⁵以中國生絲和白銀的交換為核心，大帆船貿易開始將中國與世界相連。“大量的中國商品經福建商船從月港載運至馬尼拉，然後由西班牙大帆船橫渡太平洋，轉運到阿卡普爾科(在當地舉辦盛大集市後，商人們又從這裡將貨物販運到墨西哥城，再從墨西哥城轉銷到墨西哥內地。有一部分輸入中美洲，或輾轉南下南美洲)，也有一部分貨物被運到西海岸港口維拉克魯斯，再裝船轉銷至加勒比海諸島，或越過大西洋遠銷西班牙和歐洲其他國家。這樣，一條跨越兩洋、連接美洲和歐洲的貿易航線建立起來了：中國(漳州月港)—菲律賓(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爾科、維拉克魯斯)—西班牙(塞維利亞)。”¹⁶

在大帆船貿易中有多少白銀流向中國呢？學者統計不太一致，¹⁷劍橋大學索扎(George Bryan Souza)教授認為，從 1590 年到 1644 年，菲律賓共輸入了美洲白銀一億五千四百萬西元(4,620,000 公斤，或者 4,620 噸)。全漢昇認為，“在 16、17、18 世紀間，每年由大帆船自美洲運往菲律賓的銀子，有時多至四百萬西元，有時只有一百萬西元，但以二三百萬西元的時候為多”。¹⁸有的學者統計出 1565~1644 年從墨西哥到達馬尼拉的大帆船數目大約為 132 艘，“如果我們估計每艘大帆船平均貨值為 110 萬比索的話，則總計為 1.45 億比索，約合白銀 1.05 億兩，其中大部分被運往中國”。¹⁹

中國以白銀為幣進行貿易，直接推動了世界白銀的產量。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考證，從 1521 年到 1544 年，世界白銀(不包括日本及東方各國)的平均產量為 90,200 公斤；而後 16 世紀 60 年代，

達到 311,600 公斤；又此後 20 年，為 299,500 公斤；再此後的 1581 年到 1600 年，產量達到驚人的 420,000 公斤。²⁰在這個意義上弗蘭克所說世界圍著白銀轉，白銀圍著中國轉，中國在當時的世界經濟中處於重要地位，這個結論並沒有錯。²¹

晚明白銀的貨幣化標誌著“中國社會經濟從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經濟向近代經濟的轉變，為建立一個以中國白銀為中心的世界貨幣而準備了充足的條件……同時也推動了晚明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遷——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型”。²²因此，晚明社會的變遷並非受西方的裹挾而發生，而是晚明自身的變化，當然西人到來為這個變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條件，從而使中國商品走向世界，同時全球化初期開始以中國白銀作為世界流通貨幣，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²³

白銀作為國家貨幣所存在的問題是鑄幣權並不在國家手中，而是通過貿易流通從日本和拉美獲得。拿破崙戰爭使得西班牙政府無法維持墨西哥的銀礦，加之拉美的獨立運動，19 世紀世界範圍的金銀減產不僅減少了在中國的白銀套匯交易，而且也刺激了鴉片輸入。到乾隆時人口的增加，國家廣泛使用國外的白銀，這成為清帝國的致命傷。“由於英國人沒有足夠的白銀，鴉片被用於交換茶葉和生絲。”²⁴林滿紅認為“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是白銀問題”²⁵。因此，如果說在 16~18 世紀中國尚可算作世界強國的話，“到 19 世紀是真正的衰落了。因為作為財富象徵的黃金大量流出，白銀雖然有所增長，其價值已經大大下降”。²⁶無論明王朝還是康乾盛世，均因白銀而興，但也因白銀而亡，中國的歷史與世界緊密聯繫在了一起。²⁷

三、中學西傳：中國知識與文化的西傳

1500~1800 年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除了以白銀為中心的經濟交往外，還有以來華耶穌會士為橋樑的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這構成了中國與世界的另一個重要側面。“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形成了中國和歐洲知識與文化的緊密互動，此時期中國和歐洲的關係與晚清時完全不同。梁啟超指出：“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²⁸來華耶穌會士向中國介紹了西方大航海後的新知識，如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等，有些知識雖然並非近代新知識，但作為不同的知識系統，對中國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如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而從晚明到清初西洋曆法在中國確立了正統地位後，西洋曆算之學在中國產生了影響，紅夷大炮的傳入直接影響了明清鼎革，可謂驚天動地；也正是在順康期間，天主教作為外來宗教也在中國落地生根，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論》中提出的“曙光說”，侯外廬在《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中提出的“早期啟蒙說”，蕭篔簹在《明清啟蒙學術流變》中提出的以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接合點說”²⁹，在以上學者的論證中，西學東漸都受到普遍重視，並作為歷史研究立論的根據之一。因此，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不僅提供了新的知識，而且也推動了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與發展。

關於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研究成果頗豐，這裡不再贅述。³⁰由來華傳教士所推動的“中學西傳”是中國與歐洲知識交換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與“西學東漸”並存的中歐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是中國文化首次全面在歐洲的展示，這件事與白銀資本一起構成了中國對世界的重大影響，一個是在經濟上，一個是在文化上。³¹此時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是那些呢？

第一，關於中國歷史。從皮雷斯(Tomé Pires)的《東方概要》到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中

國概說》等各類遊記，³² 早期來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就有對中國歷史的介紹，但真正在歐洲產生廣泛影響的是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álz de Mendoz)的《中華大帝國史》，這部書將一個富饒、遼闊、歷史悠久的中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大明國有十五個省份，“每一個都比我們歐洲國家大”，已經稱霸全球的西班牙人，看到中國如此龐大的文明體，驚歎不已。“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不僅把 16 世紀的中國向西方做了最客觀、最全面的介紹，也體現了 16 世紀歐洲人的中國觀。”³³ 耶穌會士入華後曾德昭(Álvare de Semedo)的《大中國志》、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的《中國新史》、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韃靼戰記》開啟了 17 世紀歐洲漢學，特別是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把一個遠比基督教文明更悠久的中國歷代年表展現在歐洲人面前，它所引起的爭論直到法國人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出版，歐洲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達到了高潮。如伏爾泰所說：“杜赫德雖然不曾走出巴黎，不認識一個漢字，但是，他借助教會同僚們所撰寫的相關報導，編纂了一部內容最豐富的關於中國的佳作，堪稱舉世無雙”。³⁴ 中國悠久歷史的真實性和高度的文明，不僅使基督教文明相形見絀，同時也給啟蒙思想家瓦解基督教歷史觀提供了有力武器。³⁵

第二，關於中國社會管理。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國家管理體系採取中央集權之下的郡縣制，而不是貴族分封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車同軌、書同文之下的中央集權制有效管理著象歐洲一樣大的國土。如此龐大的國家，千年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這使歐洲思想家感到震驚。儘管皇帝擁有極大的權力，但權力運作原則是理性和有序的，因為政府內的一切事務都要以奏摺的形式稟呈給皇帝，官員要在其中稟明所要做的事情，而皇帝所要做的只是批准或否定這些官員的建議，在事先沒有相關官員建議的情況下，皇帝幾乎從不擅自主張。利瑪竇感歎地說，雖然中國是君主制，但實際上這“更像共和制制度”。³⁶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國家管理能力遠在歐洲各個國家之上，19 世紀以前歐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人口統計，而中國這項制度從兩千年前即已確定，到 18 世紀時已經普及到全國，而歐洲的人口統計到中世紀才由教會來完成。³⁷

同時，中國科舉制度被詳盡介紹到歐洲。耶穌會士在中國看到了完全不同於歐洲的另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科舉制即文官考試制度，這樣的管理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在歐洲是沒有的，利瑪竇詳盡解釋了科舉制，並說“那些執掌國家大權的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從舉人和進士一步一步晉升上來的。……他們做官不靠任何人的恩惠與情面，不要說官員，就連皇帝講情也無濟於事。完全憑考試成績以及在以前任職期間所顯示的智慧、德行與才幹”。³⁸ 利瑪竇感歎地說“這是區別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形式”。³⁹ 幾乎所有來華耶穌會的漢學著作都介紹了科舉制，對中國這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國家管理人才的辦法給予高度讚揚。⁴⁰ 托克維爾在談到法國大革命時曾說，大革命就是“在各自領域努力摧毀豁免權，廢除特權。他們融合不同等級，使不同社會地位趨於平等，用官吏取代貴族，用統一的規章制取代地方特權，用統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門的權力機構”。⁴¹ 在這個意義上，18 世紀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感興趣應該是很自然的。⁴²

第三，儒家典籍的翻譯。一開始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受到“禮儀之爭”的影響，如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返回法國後，在法王路易十四支持下所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這是第一次將儒家原典翻譯成拉丁文。《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一書的內容包括：柏應理所寫的《致偉大虔誠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殷鐸澤與柏應理合著的《初序》(Proemialis Declaratio)、殷鐸澤所作《孔子傳》(Confucii Vita)並附孔子像、《大學》(Liber Primus)、《中庸》(Liber Secundus)、《論語》(Liber Tertius)“三書”的拉丁文全譯本、柏應理所作的《中華君主統治歷史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和《中華帝國及其大事紀》

(Imperii Sinarum et Rerum In Eo Notabilium Synopsis), 並附柏應理繪製的中國地圖。這部書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歐洲學者稱為啟蒙運動時的“《聖經》”。

衛方濟(François Noël)的《中華帝國六經》收錄了“四書”以及《孝經》、《小學》的全部拉丁譯文。到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翻譯中國典籍時,這已經是比較嚴肅的漢學研究。在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中,中國典籍翻譯已成為重要內容:選譯朱熹論著、《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孔子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小學》、《康熙帝御選硃批歷代敕、詔、法、令、諫、言集》、二程哲學與理學著作,翻譯《明代著名文人唐荊川所編文集選》、《列女傳》等。

儒家哲學傳入歐洲給啟蒙思想家一個可以用自然神學來解釋世界的例子,因為孔子不具有人格神的特點,但他同時又有宗教性關懷,孔子的思想特別適合歐洲從啟示神學向自然神學轉型的思想潮流。伏爾泰談到孔子時稱:“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稱得到神的啟示,他所得到的啟示就是經常注意抑制情慾;他只是作為賢者立言,因此中國人只把他視為聖人”。⁴³孔子的學說就是教導人們掌握理性,認識自然。而且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法自然的傾向,回答了人“遠神”後的世俗生活的精神價值。這些思想自然引起啟蒙思想家們的關注。特別是後來的宋明理學的核心“理”的概念,整個學說中的理性精神都得到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青睞,引起他們思想的共鳴。

第四,中國文學藝術與科學知識的傳入。中國的小說、戲劇此時也被翻譯成法文,如《今古奇觀: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今古奇觀: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今古奇觀:六月雪》、《趙氏孤兒》。伏爾泰讀後很受觸動,編寫了自己的《中國孤兒》。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所寫的《中國古今音樂篇》開啟華樂西傳,卜彌格(Michel Boym)對《本草綱目》以及王叔和脈經的翻譯開啟了中醫西傳,宋君榮(Antoine Gaubil)《中國天文學史》展示了中國古代科技的智慧,王致誠(Jean-Denis Attiret)關於圓明園建築的介紹,英國人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中國建築、家具和服飾設計》向歐洲展示了東方園林與建築美學。這些逐步在歐洲形成了一個新的藝術風格“羅柯柯風格”。“在羅可可時代的心理中,中國是一個模範國家,不但是藝術方面,就是智慧方面也然。在這個世紀之初,所謂中國貨,如圖畫、花瓶、雕刻、牆紙、漆器、絲絨等東方物品大為流行,盛極一時。小說中宣傳中國的情形,至於使讀者們個個都憧憬於神話式的理性國之中……。”⁴⁴

中國典籍的西譯,中國知識的西傳,從文獻上證實了歷史中國的真實性,從思想上展現了東亞文明的獨特性,從文化上證明了東方的多彩與豐富,乃至大航海時代的西方人認為“在北美發現的是土地,而在中國發現的是文明”。中國的知識與文化開始成為推動歐洲思想文化變遷的力量。

四、中國文化的世界意義

晚明到清中前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以晚清的中西關係來推想晚明和清中前期的中西關係是歷史的無知。此時的中國非但不是閉關鎖國,更談不上落後愚昧。晚明經濟的發展催生白銀從民間貨幣變為國家貨幣,白銀走向世界,白銀成為全球化初期的世界貨幣。此時的西方各國拿不出可以與中國交換的貨物與產品,只能用白銀購買中國的茶葉、絲綢、瓷器,中國產品流通世界。即便工業革命後的英國,也拿不出產品與中國交換,這成為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之一。⁴⁵此時中國的發展並非來自西方的推動,而是原生型的、內在發展的結果,西方提供了一個正在完善的世界舞台,二者結合使晚明至清中期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明清鼎革並未終止中國與世界互動的腳步,此時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為溝通中國與歐洲的重要橋樑,康熙朝的事業是在與國際互動中展開的,《恰克圖條約》的簽署解決了中俄貿易問題,《尼布楚條約》解決了中俄邊界衝突問

題,鐸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與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的來華是康熙試圖解決中國和歐洲之間的宗教衝突問題。此間“西學東漸”開拓了明清之際思想家的文化視野,天主教在康熙朝的合法化是中華文明第二次接納外來文明的確證,儘管雍乾百年禁教,但西學東漸已成大勢,中國在與世界的互動中前行。⁴⁶

中國融入世界,或者說明清之際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不僅僅是白銀成為世界貨幣以及茶葉、絲綢、瓷器在全球的流通,⁴⁷還有中華文化的西傳所推動歐洲 18 世紀中國熱,整整一百年中國是歐洲崇拜的對象,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⁴⁸

從 16 世紀到 18 世紀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是逐步豐富起來的,從最初的道聽途說到以後的親身經歷,從一般的傳教士到後來的法國來華科學家傳教士,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在逐步深入。經過他們的介紹,一個比歐洲歷史還要悠久的中國呈現在歐洲讀者面前,一個社會生活比歐洲還要多彩的中國吸引了歐洲讀者。而當啟蒙思想家們讀到傳教士翻譯的中國典籍時,他們被打動了,從伏爾泰到萊布尼茨,從魁奈到沃爾夫,即便有孟德斯鳩這樣的批評者,但中華文明的悠久與制度之完善也使他對中國的評價無法協調起來。18 世紀整整一百年的歐洲中國熱,絕非空來之風,它是中國知識與文化傳入歐洲二百年所積累的必然結果。“啟蒙時期正是中國清朝的早期和中期,這時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達到了巔峰。……中國在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像啟蒙時期這樣,使得中國的商業貿易相對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識界對中國興趣如此之大,中國形象在整個世界上如此有影響。”⁴⁹在社會生活層面,歐洲上流社會將喝中國茶、穿中國絲綢的衣服、坐中國轎、建中國庭院、講中國故事作為一種風尚。Chinoiserie 這個詞匯的出現,反映了當時法國對中國的熱情。這“突出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各個階層的歐洲人普遍關心和喜愛中國,關心發生在中國的事,喜愛來自中國的事物”。⁵⁰

中國知識與文化的傳入推生了歐洲 18 世紀的“中國熱”,從一般民眾而言只是對東方的好奇,但對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來說,中國知識所包含的智慧是一種啟迪,無論他們是讚揚還是反對。例如對中國持批判態度的格里姆寫道:“傳教士以他們對於一個非常遙遠的國家的引人入勝的記述,引起了歐洲公眾的極大興趣,公眾既無法證明這些記述的真實性,也沒有證據指責它是謊言。後來哲學家們將這些材料取了過來,依據各自的需要以令人震驚的方式加以利用,進而對他們所認定的自己國家的弊端進行攻擊”。⁵¹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 17 世紀歐洲仍籠罩在《聖經》的神學思想之下,18 世紀才出現有關地球的自然歷史論,19 世紀才出現人類和動物同屬一個自然王國的概念。⁵²而中國思想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儒家對人類世俗化生活的系統論述使人耳目一新;唐朝以前中國人並不知道基督教的事實瓦解了基督教的普適性神話,中國歷史年表的真實與可靠,動搖了中世紀的基督教歷史觀。所有這些不僅在知識上,更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為走出中世紀的歐洲思想界提供了另一種文明類型,撼動了歐洲中世紀的傳統文化。

因此,晚明至清中前期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與思想在歐洲的影響是文明互鑒的經典事件。但現在有一些學者用後現代史學否認這一時期傳入歐洲知識的真實性,用“誤讀”來化解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任何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接受都是從自身文化變革的需要出發的,其在吸收外來文化時都會根據自身文化所需對外來文化進行加工和改造,這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規律。但不能因為接受者對知識的理解受到自身文化的影響而產生了對異文化的“誤讀”,就否認知識在傳播中的真實性;同樣,不能因傳播者在傳播知識時受其自身文化的影響,對其所傳播的知識附上自身的色彩,就完全否認了所傳播知識仍具有真實的一面。這種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誇大了知識傳播中接受主

體的自身文化背景對知識傳播和接受的影響，並將文化之間的交流、知識在不同文化之間的流動完全龜縮為一個主體自身文化背景問題，將豐富的歷史過程僅僅壓縮為主體自己的文化理解問題。這樣也就“無所謂客觀的知識，也無所謂真實或虛構”。這種理解顯然是片面的，非歷史的。^⑤

19 世紀以後，伴隨著西方對全球的殖民與掠奪以及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開始領先於中國，中國至晚清後的衰落使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大反轉。在赫爾德那裡中國只“是一具木乃伊”，在黑格爾那裡，孔子毫無智慧，中國是一個沒有哲學的國度。歐洲中心主義開始盛行，16~18 世紀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在西方的歷史教科書中已經消失。今天我們講述對晚明至清中期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國對世界經濟的推動和中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並非沉醉於往日的榮光，而是講述一段真實的歷史事實，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仍有人把歐美文化說成是一個“自我成聖”的文化，外來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不足為道。這不僅在知識上不符合歷史，也反映出這種觀點對歐洲思想自身成聖的神話的迷戀，對 19 世紀以來西方思想觀念的崇拜。

中國知識與文化的西傳是 16~18 世紀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表現。但當下中國學術界在理解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關係時，要麼從後現代主義出發，否認中國文化對當時啟蒙思想的影響，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說成一個自我成聖的過程；要麼將啟蒙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對立起來，無法揭示二者之間的歷史和思想的聯繫，從而無法揭示出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現代性意義。

明清之際中國與世界的互動，揭示了近三百年的中國與世界的真實歷史，^⑥給了我們從文明互鑒考察中西文化發展的一個新視角。百年彈指一揮間，走出晚清悲情，重新確立中國文明在世界歷史進程的作用，重新思考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在全球史和長時段的歷史視閫下重新確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①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52 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偉大的地理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的開拓使銷售市場擴大了許多倍，並加速了手工業向工廠手工業的轉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13 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1 頁。

③布留川正博：《奴隸打造帝國：征服、殖民、剝削，從奴隸船看資本主義的喋血貿易》，張萍譯，台北：智富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鄭家馨主編：《殖民主義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④湯開建：《明代澳門史論稿》（上），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37~65 頁。

⑤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nd 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 106; 樊樹志：《晚明大變局》，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⑥萬明、徐英凱：《明代〈萬曆會計錄〉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第 2 頁；萬明：《明代中國白銀貨幣研究：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進程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 年。

⑦⑧⑨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 84 頁；第 33~34 頁；第 32 頁；第 20 頁。

⑩⑪戚印平：《耶穌會士與晚明海上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第 257 頁；第 294 頁。

⑫羅德里格斯：《日本教會史》，第 267 頁，轉引自戚印平：《耶穌會士與晚明海上貿易》，第 297 頁。

⑬貢德·弗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第 205 頁。

①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王玉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②萬明：《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687頁。

③C. R. 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④陳台民：《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香港：朝陽出版社，1985年。

⑤何芳川：《崛起的太平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88頁。

⑥韓琦：《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對明王朝的影響》，載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⑦參閱沙丁等：《中國和拉丁美洲關係簡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頁；梁方仲：《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72頁；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00頁。

⑧全漢昇：《再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載《中國近代經濟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⑨吳傑偉：《大帆船貿易與跨太平洋文化交流》，北京：昆侖出版社，2012年，第296~312頁。

⑩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⑪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第245頁。

⑫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史建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萬明：《明代中外關係史論稿》；馬德斌：《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一種跨國比較視野》，徐毅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王國斌、羅森塔爾：《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周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

⑬⑭林滿紅：《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詹慶華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頁；第265頁。

⑮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

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275頁。

⑯本文討論的是1500~1800年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關於晚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從白銀作為國家貨幣開始，中國與世界已經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對中國近代以來發展的研究僅僅從國內視角來考慮已經遠遠不夠了。

⑰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9頁。

⑱許蘇民：《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亟待實現三大突破》，天津：《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⑲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柏理安：《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毛瑞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張西平：《交錯的文化史：早期傳教士漢學研究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年；吳伯姪：《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⑳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㉑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㉒張鎧：《西班牙的漢學研究（1552~201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03頁。

㉓藍莉：《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頁。

㉔吳莉葦：《當諾亞方舟遭遇伏羲神農：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上古史論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除了公開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歷史書籍外，教會內部報告也成為當時歐洲瞭解中國當代史的重要知識來源，以來華耶穌會的年報告（Carta Annua）為例，它在中國各地的傳教紀要為基礎加以整合，再寄回耶穌會總部。例如，年報告中有傳教士利類思（Louis Baglio）和安文思作為張獻忠的“天學國師”為其效力，還為張獻忠的某一側房的娘家二十餘人受洗的記載，安文思留下的《四川省毀滅即四川教會的喪失》報告詳盡介紹了張獻忠政權的情況。在南明小朝廷則先後有瞿安德（Andre-Xavier Koffler）、卜彌格、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等在其中活動，並使宮中皇后等人受洗入教，留下了第一手

的珍貴材料。這些報告與信件既有對中國的總體介紹,也有傳教士在華具體活動的介紹,如何大化(Antônio de Gouvea)的《遠方亞洲》就是來華耶穌會內部最早的中國研究著作。

⑳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邊玲玲譯,第244頁。

㉑Ssu-yü 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4 (Sep., 1943), pp. 267-312; 中譯本參閱《中外關係史譯叢》第4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200~232頁。

㉒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49頁。

㉓孟德斯鳩是“貶華派”的代表,他從自己的氣候與地理環境決定社會制度的理論出發,認為有三種類型的國家制度:依仗美德的共和政體;依仗榮寵的君主政體;依仗畏懼的專制政體。他認為“中國是一個以畏懼為原則的專制國家”,但由於中國的宗教、習俗、道德、法律是融合在一起的,加之氣候和地理特點,孟德斯鳩在判斷時也相當困難,也不很一致。他又說“由於某些特殊的或許是獨一無二的情況,中國的整體沒有達到它所應該達到的腐敗程度。大多基於氣候的物質原因抑制了這個國家裡的道德原因,進而演繹出了種種奇跡。暴政歸暴政,氣候將使中國的人口越來越多,並最終戰勝暴政。”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許明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51~152頁。

㉔伏爾泰:《風俗論》(上冊),梁守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50~251頁。

㉕福利德爾:《現代文化史》(中),王孝魚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03頁。

㉖仲偉民:《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

㉗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曹雯:《清朝對外體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㉘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全漢昇口述、葉龍整理:《中國社會經濟通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林滿紅:《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㉙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利奇溫(Adolf Reichwein):《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的接觸》,朱傑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孟華:《伏爾泰與孔子》,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陳豔霞:《華樂西傳法蘭西》,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安田樸(René Étiemble):《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羅滌:《18世紀法國戲劇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吳澤林:《托爾斯泰和中國古典文化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

㉚S.A.M. 艾茲赫德(S.A.M. Adshead):《世界歷史中的中國》,姜智芹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275~276頁;Berger, Willy R., *China-Bild und China-Mode im Europa der Aufklärung*, Köln/Wien: Böhlau Verlag, 1990; Chen Shouyi, *The Chinese Garde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ien Hsia Monthly*, 2 (1936), pp. 321-339, repr. in Adrian Hsia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39-357.

㉛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第121頁;嚴建強:《18世紀中國文化在西歐的傳播及其反應》,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

㉜格里姆:《文學通信》第2卷,第151頁,轉引自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第268頁。

㉝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國人的智慧》,何高濟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4~185頁。

㉞僅僅將啟蒙時期思想家對中國的學習概括為“耶書燕說”也是不全面的,歐洲早期漢學史的研究證明,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絕大多數是真實的知識。

㉟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西文文獻中的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作者簡介:張西平,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漢學》主編。北京100083

[責任編輯 陳志雄]